

留学的包容性：是否支持交换项目？

玛丽·马克提

玛丽·马克提 (Mary MacKenty):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 (the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
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mary.mackenty@estudiante.uam.es

大学的海外游学 (study abroad) 网站上到处都是年轻学生在重要国际地标前的照片。他们很少被描绘成与当地学生一起在当地大学“出国留学”。大多数美国学生使用由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和第三方机构运营的“混合” (hybrid) 项目，这些项目统管他们的学术 (很多是内部的)、旅行、住宿和课外活动。而交换项目 (exchange program) 是最少被利用的，尽管是最便宜的选择。考虑到成本是海外游学的主要障碍之一，那么为什么大学不更好地利用他们的交换项目呢？

交换协议允许美国学生直接在合作院校注册，同时支付他们在本国大学的学费，并维持他们的经济援助。学生自行安排机票和住宿，因此不需要支付额外的项目费用。事实上，交换项目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很普遍，其中欧洲的伊拉斯谟项目 (Erasmus program) 最为知名。接收院校提供广泛的学术课程，在人数不足的专业和辅修课程中提高包容性。交换项目也为可能已经具备所需语言技能的第二代学生打开了大门。同时，它们往往是与来自不同地区的主办院校一起发展的，从而使选择更具多样性。

那么，为什么美国学生要为有组织的出国游学项目支付更多的费用呢？也许这是保证学分转移最简单的选择？也许交换生项目在后勤和学术上都太有挑战性了？或许，美国的民族中心主义世界观让人觉得，国外高

等教育质量较低，不值得美国支付学费？或者，也许是这种概念已深入人心，从而使得学生们认为留学项目是留学的唯一途径？虽然这种被社会接受的出国游学概念可能对学生和大学都很方便，但一个不幸的后果是，它创造了限制我们与当地环境互动的美国“气泡”。出国的目的难道不是让自己沉浸在另一种文化中，并在它带来的挑战中成长？而不是躲避文化差异吗？由于当前新冠疫情对留学影响的不确定性，入学人数下降可能会导致项目难以为继。也许应该进一步研究交换计划，因为它们所提供的机会和所带来的挑战，都是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增加包容的可行选择。

更深层次的文化感受

通常，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对海外游学缺乏语言和跨文化学习表示担忧，这至少部分是由于缺乏文化沉浸引起的。这些项目通过寄宿、实习、志愿服务、语言交流和支持跨文化和/或全球学习的课程，鼓励学生与当地文化的互动。尽管如此，让学生在本地建立友谊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选择花时间和本国的同龄人用英语交流。这些游学项目的结构通过把学生安置在一个舒适的美国中心来为他们提供庇护，而交换项目则挑战他们通过与当地人和机构的互动来学习如何驾驭外国环境。

参加交换项目的学生必须自己组织学术协议、旅行计划、住房和社交生活。由于缺少现场工作人员作为项目学生的对话者，他们不得不与接收院校的人员进行沟通，以安排他们的住宿。学校也会提供入学指导，所以他们的第一个接触对象是当地和国际学生，而不是美国学生。学生与当地学生一起上课，获得了另一个社会互动和发现新视角的机会。在新环境中学习的经验帮助他们发展横向技能，如适应能力、灵活性和跨文化团队合作能力，这是 21 世纪工作场所的宝贵能力。他们可能不住寄宿家庭；然而，一般的住宿安排是与当地学生合住宿舍或公寓。学生从在另一个国家解决问题的经验中来学习，这可以促使他们增加自信和独立能力。文化的沉浸本来就比较深，因此提供了更多的跨文化、语言和学术学习的机会。

太多挑战？

然而，游学项目受欢迎是有原因的。他们保证后勤工作顺利进行，为文化冲击提供情感支持，也为出现任何问题提供实际支持。此外，对于那些注册了一些本地课程的学生，课程计划保留了一份预先批准的名单，上面列出了过去的学生成功学习过的课程。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大多数课程都要收费，那么学生必须要求这些信息支持；但是，我们明智的做法是重新审查哪些是真正必要的，以及这些安排是否可以由本国院校与接收院校来提供。

在后勤方面，如果我们认为学生们足够独立，可以组织自己的休闲旅行，那么在今天的科技时代，千禧一代当然可以在网上预

订他们的旅行和安排他们自己的学生宿舍。接收院校也会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在城市的后勤信息。另一方面，学术指导和确保学分互认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在本国大学，指导教师管理着许多协议，这使得他们很难深入了解每个接收大学的学术体系、学位项目和具体课程的复杂性。除了提供课程列表和课程表外，接收院校不一定提供学术指导。这可能会导致学生为了获得学分批准而选择与他们的学术背景不相符的课程。最后，通过伙伴计划 (buddy program) 的普及和提供当地历史和文化课程，接收院校对交换生的社会和文化融合的支持得到了改善；但是，没有现场人员能够提供 24 小时的协助。

为交换项目提供支持

交换项目有潜力提高出国留学的包容性。然而，需要更多的支持来克服课程和文化方面的挑战。更多关于接收院校学术项目的信息是必要的，以确保学生注册的学术相关课程将使他们获得成功。院校必须了解自己的学术文化，以便将这些文化恰当地传达给合作伙伴。为促进出国留学中跨文化学习而设计的课程，可以在学期中以在线授课的方式为交换项目做适当改变。在学术设置中添加与文化差异相关的模块也是恰当的，为学生创造一个空间来反思他们的直接入学经历。对于交换生所面临的具体挑战，还应进行更多的研究，以改善他们的体验。最后，如果我们要成功地将交流项目作为一种可行、成本效益高、沉浸式文化的海外留学选择，我们就需要改变对美国游学项目的看法，不再将其视为服务提供者模式。

非洲大学的教学任务和教学方法

哈里斯·安多

哈里斯·安多 (Harris Andoh): 南非范德比耶尔帕克瓦尔技术大学 (the Va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研究与高等学位处、加纳阿克拉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高等教育政策评估专家

电子邮箱: andoharris@gmail.com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成立时, 所有非洲大学的任务是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大多数非洲大学更注重教学, 而不是其他核心活动, 如社会服务和研究。尽管它们从未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机构”, 但很明显,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这种描述都很适合它们。

很少有非洲大学的新任务和战略计划与政策将教学作为一项核心任务。例如, 莫桑比克的爱德华多-蒙德拉内大学 (the Eduardo Mondlane University) 宣称自己是一所“从根本上以教学为导向的机构”, 加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Ghana) 寻求成为一所“高质量的教学”机构, 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Ibadan) 将“优秀的教学和学习”作为其新的使命。另一方面, 纳米比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amibia) 和博茨瓦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otswana) 的目标是在质量教育之外关注跨国研究, 而埃及顶尖大学之一的阿斯旺大学 (the Aswan University), 甚至没有在其新的使命声明中提到教学。

非洲大学的新政策和战略计划显然没有重点把教学作为一项核心使命和把发展教师的教学方法与技能作为一项明确目标。然而, 为了确保各级教学的有效性, 教学技能对于向学生传授知识至关重要。非洲大学越早认识到教学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他们就能越快

地成功地改善他们的教学结构。

关键挑战

为了加强非洲大学的良好教学, 就需要确定与教学政策有关的关键挑战和当前教学努力的弱点。非洲各大学并未试图加强各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与概念的教学。大学教师在课堂内外的教学讨论集中在一般的社会概念上, 而不是教学理论和概念上。非洲大学的教学和教学问题存在若干关键挑战, 包括任命没有教学背景或正式教学资格的学术人员; 作为教学发展的一部分, 缺乏对员工的强制性培训; 缺乏相关教学政策来指导大学如何提高教职员工的的教学发展技能。

非洲大学教学人员的技能培训集中在研究方法上, 而不是教学和学习。只有在南非, 由于其历史性的历史, 政府才将教学发展补助金 (Teaching Development Grant) 分配给大学。但是, 在提供赠款的情况下, 为教师提供的教学培训类型与质量不足以使受益者具备大学教师教学的适当技能。

教学政策将指导大学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对非洲大学政策的在线搜索显示, 只有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 (the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在 2018 年采用了一项教学政策, 旨在促进实现其“愿景和制度战略框架” (Vision and Institutional Strategic

Framework)。其他著名的大学，如加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Ghana)、伊巴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Ibadan) 和开普敦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要么缺乏教学政策，要么还未在网上宣布这类政策。相比之下，欧洲的大学特别强调拥有教学资格的学术人员的重要性。

在斯高帕斯 (Scopus) 数据库对“教学法”和“非洲”进行搜索，结果显示：除了南非在该领域发表了 635 篇文章外，加纳、肯尼亚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在过去 30 年平均发表了 5 篇相关论文。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些出版物中有 62% 主要是关于教育研究的。

伊巴丹大学不向其教员提供任何关于教学技能的正式培训，而是为新雇用的教员提供关于教学和学习的讲习班。在加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Ghana)，有一个针对新教师的初始培训项目，其中包含了教学的重要组成元素。加纳夸梅·恩克鲁玛科技大学只在教师提出要求时才向他们提供教学技能。在开普敦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新学者实践者计划” (New Academics Practitioners) 只向教员提供基本的教学技能培训。该大学的“学术人员发展计划” (Academic Staff Development)，包括教学改进倡议，旨在为教师发展反思性实践和营造持续学习的文化。自 2015 年以来，南非茨瓦尼理工大学与芬兰哈格哈里亚应用科学大学 (the Haaga Heli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合作，为教师提供职业教学的研究生文凭，因此被认为是该领域的领导者。

这些非洲著名大学的例子表明，改善教学方法的努力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克服机构层面和教师个人层面的挑战，在教学使命中实施更深层次的结构变革，并强调教学政策和注重质量的教学培训，都应明确优先考虑。良好的教学应该是坚实且被认可的教育方法的结果，包括行为主义、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

前进道路

非洲大学应该设计和实施结构化计划，以增进良好的教学和学习做法。加纳大学已经为此做出了努力，学校相关的讨论使学校本身推动建立了一个教学中心的决定，但这一决定缺乏紧迫感。

一个更系统化的教学政策应该解决关键的理论问题以促进教学，比如课程的非殖民化、包容性、如何正确地使教学与学科的具体内容相一致的问题，以及如何加强有关理论概念与教学方法的教学等问题。教学政策还应包括相关管理问题，如教学作为员工晋升标准的重要性，并注重质量和教学成果，而不是教学年数。

非洲大学应认识到，没有适当教学技能的教学对学习结果会造成不利影响，适当和系统的教学培训应列入非洲大学的未来战略计划和改革议程。这是追求真正学术成功的关键标准。最后，向大学参议院或管理机构提交的年度教学报告可以作为检测与评价非洲大学促进教学方法发展的一种手段，报告应该包括教师为取得公认的教学资格而进行的活动信息。